

● 中华全景百卷书

历史系列

10

鸦片战争到 五四运动

李明伟

● 北京出版社

中
华
军
史



中华全景百卷书

◎历史系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李明伟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全景百卷书:历史系列/朱新民主编. --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10

I. 中… II. 朱… III. ① 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② 历史—中国 IV. K.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 第 16080 号

中华全景百卷书

历史系列

※

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

北京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排印中心排版

腾飞胶印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6 印张 556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0-02562-3/G·794 (1~10) 定价:40 元

《中华全景百卷书》 编委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 星

总编委员会主任：李志坚

总编委员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 编 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马艳平 王 红 王 伟

王 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王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骊岭 区界名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 达 刘 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骧 刘森财 成绶台 孙玉琴 孙彦钊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宋剑霞 忻汝平 汪家兴 张 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绥祥	陆道中	武 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 亮	周育德	金启风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 时	空 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 昌	胡 洁	胡振宇	郝 旭
春 晖	钟 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 冶
唐 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 超	葛晨虹	鲁 葳	焦国成	曾令真
谢 军	郭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伸

副总编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

装帧设计:王 晖 尚云波

编辑人员: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鲁 葳 戴瑞丰

主旋律的音符

(总 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100卷分10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100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100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100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45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目 录

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
二、祖国在危亡中	(7)
三、“洋人的朝廷”	(12)
四、中国社会力量的演变	(16)
五、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22)
六、革命党力量的集结和发展	(28)
七、立宪派所追求的立宪运动	(38)
八、北洋集团势力的兴起	(43)
九、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48)
十、清王朝覆亡前的大混乱	(52)
十一、立宪派发动的速开国会请愿	(55)
十二、黄花岗起义	(59)
十三、四川保路运动	(62)
十四、武昌起义	(67)
十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73)
十六、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	(79)
十七、“二次革命”及其失败	(87)

十八、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失败	(92)
十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97)
二十、新世纪的曙光	(104)

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话说古老华夏，自战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中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诸朝代，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曾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众所周知，在古代，我们中国就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建造了万里长城、开凿了五千多里的大运河。但是，残酷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又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长期处于发展迟缓的状态之中。到清代后期，中国封建制度已处处显露出土崩瓦解的不祥之兆。

然而，世界局势并没有因中国社会的停滞落后而停止变化。十六世纪西欧各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于明朱崇祯和清初康熙时期，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沦印度为殖民地，都发生在我国所谓乾隆盛世时。到1807年，第一艘蒸汽轮船在西方国家造成，世界形势急剧变革，新兴资产阶级国家对中 国施行炮舰政策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而处于釜中鱼、幕上燕这种险境的清朝道光皇帝还懵然不知，大做其天朝上国万世长存的甜梦呢。

清朝统治者害怕中国人在思想上受外国人的

影响而对其统治不利,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英国资产阶级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垂涎三尺,决心要打开中国的大门。1793年英国曾派特使马戛尔尼到中国,向清政府提出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割让舟山附近岛屿、减低关税等无理要求,被清政府拒绝。此后,英国又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以商品来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还很不活跃,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英国的洋货,在中国市场上却很难卖出去。1821年,英国运到中国来的花呢和天鹅绒,由于没人买,不得不一再降价,最后竟亏本百分之六十。

英国用一般的工业品打不开中国的大门,绞尽了脑汁,找到了一种可以作“敲门砖”的特殊商品——鸦片。鸦片是一种可以吸食,一旦吸上瘾,就很难戒掉的毒品。英国强迫和引诱印度农民大量种植鸦片,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来,输入量年年增加。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间,仅英国运进中国的鸦片就达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至四亿银元。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长,当时中国吸鸦片的人不下两百万,清朝军队的不少官兵也成了大烟鬼。道光年间,烟毒泛滥,摧残了成千上

万的中国人的身体，国家白银哗哗地外流，国家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危机。朝野上下，人心沸腾，一些具有爱国热忱的有识之士，纷纷向道光帝上奏章，要求禁烟。1838年10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说：今鸦片流毒天下，为害深重，法治当严。如果以平常态度看待，恐怕数十年之后，中国几乎就没有可以御敌之兵，也没有可以充饷之银了。这些话，说动了道光帝的心。1838年底，道光帝宣召林则徐进京，半个月后，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收缴鸦片两万多箱，约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是年6月3日，在他的亲自监视下，用盐卤和石灰浸化的办法，在虎门海滩开始销毁收缴的鸦片，足足烧了一个月。当时虎门上空，炎烟滚滚。这就是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壮举——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以后，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眼看鸦片这块“敲门砖”刚刚显灵，就挨了当头一棒，不禁恼羞成怒，亮出最后一招，决定派兵来打。1840年6月，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战争从1840年6月英国侵略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定《南京条约》为止，打了

两年零两个月，最后以清政府的失败和投降而告结束。你道清朝为何失败？就是因为清朝的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军事落后。而造成落后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清朝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在战争中，清朝从皇帝到那些王公大臣和将军，处处表现出昏庸、愚昧和无能，由他们来指挥作战，怎能不打败仗！

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清王朝的闭关政策宣告破产。从此，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中国近代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把古老的中国从沉睡中惊醒。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林则徐，就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虽然是清王朝的高级官员，但他不像那些顽固守旧的官僚分子一样昏聩，他敢于正视现实，愿意接受西方的新东西。他到广州以后，就非常关心外国的情况。通过和外国人的接触，他认识到，西方国家船坚炮利，不可轻视。为此，他派人打听外国的情况，购买外国的报纸，翻译外国的书籍，根据外国人对中国时事的意见，翻译了《华事夷言》。和外国人打交道，很需要了解各国的有关

情况。为了这个目的，林则徐又组织人员翻译了《四洲志》，该书是英国人慕瑞所著，原名《世界地理大全》，这本书对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很有帮助。

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由于他积极了解西方，掌握了敌情，大大加强广东沿海的防务，使英国侵略者在广东沿海无隙可乘，几次进犯，无从得手。就在反侵略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穆彰阿、琦善一伙投降派，却极力诬陷林则徐，胡说什么英国的进犯是林则徐“禁烟过激”引起的。昏庸无能的道光皇帝，竟于1840年9月，下旨将林则徐交吏部议处，改任琦善为钦差大臣。琦善到广州后，主张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结果，当英军侵犯广州时，一败涂地。

林则徐被割职以后，还念念不忘国家的安危。他在上道光帝的“请求治罪”的奏折里，还建议清政府用海关税银造船造炮，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林则徐这一兴办国防工业、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却被道光帝用朱笔批了四个大字：一片胡言。将林则徐充军新疆。

一百多年过后，历史已对这位爱国者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新中国诞生，天安门前树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基四周刻有八座浮雕，最先一幅是

虎门焚烟，林则徐像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人民为他在“青史”上作了永垂不朽的定论。至于喜怒无常、处理国家大事弄到瞎七搭八程度的道光皇帝，只好作为一个昏庸不堪的糊涂虫挂在“青史”上做陪衬了。

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招致外祸的因由在内祸，这内祸就是中国封建主义垂死挣扎的顽固性。清末几朝皇帝从道光、咸丰二帝以至慈禧太后，都是顽固愚妄，冥顽不灵。他们对时代变革毫无了解，为了便于统治，阻挡种种改革，他们禁锢人民的思想，自己也像盲人骑着瞎马夜行，为要愚民，结果自愚。然而民是终究愚不了的。华夏子孙素有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历代又都能产生不少奇才异能之士。在科举网罗下，天下士人并不尽入牢笼，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首先从海外摸到新消息，突破框框，在黑沉沉的长夜中敲起了一声声警钟。稍后，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同农民相结合，把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或阶级局限，但他们为解救民族危亡而寻找真理的不懈努力和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还陆续出现了冯桂芬和容闳，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

复,还要包括马建忠、薛福成、黄遵宪、郭嵩焘一些人,他们都曾经提出过他们的前辈所没有提供的新的东西,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努力。尽管多少救亡图存的理想蓝图成了画饼,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只是推翻了一个皇帝,并未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但是,正是这些率先踏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驱者,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才使后来者认识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我们中国人从七、八十年的探索中,终于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

历史是一面镜子。近代中国激烈而复杂的斗争虽然过去了,但斗争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历史规律,在今天还有借鉴作用。学习和了解近代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从而更加坚定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信心和决心。

二、祖国在危亡中

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太深重了。这是

中国近代社会最突出的事实。

一百五十年前，英国军舰的猛烈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这时起，中国开始丧失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完整主权，走上半殖民地的悲惨道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到处可以看见那些傲慢的、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趾高气扬地支配一切的洋人老爷，看到那些用步枪、刺刀以至机枪、大炮任意杀戮中国百姓的外国军队，看到那些在工厂、矿山中残酷地榨尽中国劳苦大众血汗的外国资本家们。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听人摆布。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国人的心头。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曾满怀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一切，不能不深深地刺痛每一个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中国人的心，驱使他们苦心焦虑地去寻找拯救祖国的道路。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实。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次战争的失败，有如晴天霹雳一样，使全中

国为之震动。洋务运动中人们曾寄予很大期望的新式海陆军，在战争中那么快就溃败了，虚幻的安全感突然消失。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的一个省——台湾被割弃，重庆、沙市、苏州、杭州等地被开放为商埠，日本人被允许在中国所有通商口岸自由开设工厂，还要向他们支付二万万三千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亲身经历过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玉锜）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有被西方大国打败，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么惨，条约又订得那么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这一年，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发表了震动世人的政论文章《救亡决论》，第一次喊出了“救亡”的口号。许多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觉得眼前的问题不再是什么“自强”、“求富”，而是需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了。“救亡”成为一切爱国者心目中最响亮、最有吸引力的口号。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历程中一个重大的变化。

甲午战败给中国的打击已经够沉重了。过了两年，德国又强行租借胶州湾，世界列强又纷纷效法，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1898年，康有为上书光

绪皇帝，大声疾呼局势的紧迫和严重：“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处皆应”，“救亡之道无他，只有发愤而已”。戊戌维新运动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走向高潮的。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承受着帝国主义侵略重压的下层劳动人民，决不甘心默默忍受外来的侵略和奴役。他们不顾一切地拿起武器，进行英勇地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共同向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朝政府逃往西安。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回忆道，他在杭州听到这一消息，觉得天好像塌了下来似的，立即放声大哭。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规定中国支付赔款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使馆区和从北京到山海关的沿铁路重要地区，由外国派兵驻守，清政府承担镇压“与诸国仇敌”的爱国活动的责任。这一时期，沙皇俄国的军队一直占领并准备吞并整个东北。这一切，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度的屈辱和痛苦，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如果说,1901年以前,列强还只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攫取各种特权,那么,1901年以后则变本加厉,帝国主义列强开始通过借款和强行承筑等方式,夺取我国的铁路筑路权和矿山开采权,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当时许多人感到:外国人一旦完全控制了我国的铁路和矿山,那就是握住了我们的命脉,就是要吸干我们的骨髓,在某种意义上比明火执仗的侵略更为危险,更能置中国于死地。

列强们还在中国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争夺的焦点是东北。沙俄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中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战后却迟迟不肯撤兵。许多爱国者感到,这无异于把中国看作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惨祸,仿佛时时刻刻都可能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道:“你但问俄国占东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问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国占东三省的事倘若不虚,这瓜分的事一定是实了。你看德国占了胶州海口,俄国、英国、法国,也就照德国的样儿,各占了一个海口,于今俄国占了东三省,请问中国有几块与东三省一样宽的地方?将来分的时候,恐怕还不够分哩!于今还是问真问假,真正是不知时务了。”这段话,确实反映出当时无数爱

国者为祖国命运而忧心如焚的焦急心情。

1904年，日本和沙俄又为争夺远东霸权而爆发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延续达一年半以上。它在中国东北的国土上进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同中国一水相隔的邻邦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强烈的刺激。

“救亡”成为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还有其它什么可谈。中国的先进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之付出生命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一中心问题。离开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辛亥革命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三、“洋人的朝廷”

在这样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然而，这时的清朝政府却倒行逆施，不惜大量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这个王朝，本来早已日趋衰败，但外表上仿佛仍是威严显赫的庞然大物，使人望而生畏。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清朝政府“新政”的神话打破了。

这次战争使三十年来一直被大吹大擂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清王朝长期倚为柱石的淮军和北洋海军也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一时间形成了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而且战后赔款二万万三千万两银子，造成了财政平衡的破坏，使财政极度空虚。日本割据台湾，最初还要割辽东半岛，清廷连“祖宗发祥之地”也无法保障，国家首都门户洞开，继续生存遭到直接威胁。对外的投降、屈辱，内部腐败的充分暴露，使这个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在人们心目中丧尽了尊严，再也无法继续保持统治的稳定。可以说，甲午战后的清政府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中勉强维持了十几年。

接着发生的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权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1901年2月，当列强提出议和大纲时，流亡西安的清政府发出一道煌煌上谕，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以后，清政府在各方面更加坚决地执行对外投降的政策。它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人民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顾问。各级地方官更是兢兢业业地礼敬外人，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特殊权益。

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人民大众也就自然把反抗外国侵略者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洋人的朝廷”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点破后，立刻不胫而走，在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对人民经济上的榨取也进一步加重了。清朝的财政本来从甲午战败后就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辛丑条约》又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本息相加，每年需支付赔款二千余万两，这样的巨额赔款几乎是当时的中国人难以偿清的。清政府只得采取向外大举借债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勉强维持下去。清政府还在国内加紧扩军，除袁世凯练成的北洋六镇以外，还计划在每个省编练新军一镇，作为维持他们统治的武装力量。所有这一切费用都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田赋、厘金、盐课等旧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

中饱私囊,任意诛求,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使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极端腐朽昏聩的清朝政府尽管标榜实行新政,他们采取了奖励设厂和废除科举学堂等措施,虽然多少也起了一点作用,却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人民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推翻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希望。这是现实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

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政府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的地步。1911年5月12日,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当时的中国还流行着“反满”救国的口号,认为清朝政府是一个“异族”政府,而必须加以驱除。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的高涨,根本的原因不在汉族传统民族思想的重新抬头,而在于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许多人认为,清朝政府之所以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地推行卖国投降的政策,根本原因就在它是“异族”的政府,因而毫不

关心汉族人民的命运，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中国的主权。也就是他们常常举出的一句话：“宁赠外人，毋予家奴。”这种看法自然谈不上对事物的本质作出科学的分析，但在当时却使许多人深信不疑，于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使“反满”的口号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这种反满宣传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同时，由于过份强调满汉矛盾，反而容易使人放松去正面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整个封建势力这两个主要的敌人。可是，细心地剖析一下，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宣传所包含的合理的内核：它要求人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清革命，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反满浪潮的高涨，从根本上说，只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救亡运动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罢了。

二十世纪初年，腐朽的清朝政府已经变成“洋人朝廷”，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它同人民大众之间原来已经十分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反满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已成为广大人民的普遍要求，成为一种不可阻遏的力量。

四、中国社会力量的演变

但是，中国要奋起，单靠有一股宁死不屈的反

抗精神和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已经变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内部旧有的那些社会力量已不能给中国指明新的出路，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

地主阶级改革派，在鸦片战争以及以后的一些年代中，曾经在反抗外来侵略者，唤起人们睁眼看世界等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他们越来越难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逐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声匿迹了。太平天国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但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维护革命的纪律，以便集中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也缺乏用科学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以指导革命的能力。太平天国虽然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最终仍不免失败。义和团运动的主力是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也有一些中小地主参加。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并制止了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企图，但也存在严重的弱点，包括许多愚昧落后的东西，最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武装进攻和清政府的叛卖下失败。

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日趋解体，一种新

的社会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成长起来并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尽管他们的力量还很微弱，并不能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但毕竟为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破坏，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一些原来的买办、商人、官僚、地主开始向新式工业投资，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甲午战后，受到民族危机深化、特别是外国资本对华投资的刺激，国内出现了投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高潮。二十世纪初，特别是1903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使局面发生很大变化。这种投资近代工业的浪潮不仅壮大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力量，而且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是上海、武汉和广州。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11年，共建各类近代企业一百一十七家；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这时已超过广东，跃居全国第二位，共建企业三十七家；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地区（包括北京），共建近代企业四十五家；以广州为中心的广

东地区,共建近代企业四十八家。其它各省工矿企业也有较大的发展。随着近代工矿企业的迅速增长,近代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到1911年,全国商办轮船公司有二十家,商办银行十二家。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壮大,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亦有所强大,他们虽然独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担,但却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并且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朝政府的压迫,有着爱国和民主的思想。可是,他们也有严重的弱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毕竟十分微弱,因此相当软弱。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大多是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并且还保有不少封建田产,同官府往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政治态度基本上采取维护清朝政府统治的态度,害怕革命的发生。一般的中小工商业者由于力量微弱,又常有身家性命和财产保障等重重顾虑。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长时间内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不敢以强硬的、特别是暴力的手段来争取在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力。于是,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这副本应由他们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却更多地由刚刚形成的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群挑

起来了。这种看来颇为奇特的现象，却是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甲午战后，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再也不是旧式的封建士大夫读那些古老的“圣贤之书”。由于中国社会变化而产生的需要，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出现了。

区别于封建士大夫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已不再受四书五经诗赋制义式的封建教育，而是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自然科学。帝国主义的凌侵，清王朝的腐朽，民主潮流的激荡，促使他们之中许多有志之士迅速革命化，自觉地承担起民主革命先锋和桥梁的重任。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和青年学生出洋留学是新的知识分子群出现的主要原因。截至1910年，国内各级学堂的学生，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万零七百三十九人。这比封建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队伍扩大许多倍。与此同时，青年学生掀起了东渡日本或远涉欧美的留学热潮。青年学生大批涌向日本，他们学习勤奋，思想活跃，加之身在异国，远离清朝统治势力，关心国事又敢于发表意见，大都倾向革命。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往往担任各级学堂的教习、监督或“新军”军官，他们把所学得的新知

识和新思想在这些人员密集、文化较高的单位传播，促使一些学生和新军官兵倾向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活动分子，大多数是从这些受过西方近代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许多人主观上真诚地认为自己是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他们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庇尔，甚至华盛顿、拿破仑自许。他们心目中大体上以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作为榜样，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求的范围。他们的奋斗目标和主张如果实行起来，只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客观上正代表着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在当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把他们称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适当的。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在日趋解体，曾经统治了这个社会几千年的官僚地主阶级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控制了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地方宪政等诸多领域。袁世凯从创建新建陆军起家，编练北洋新军，举办北洋新政，聚集了大批以依附皇朝、追逐利禄为出发点的官僚政

客和官僚资本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北洋集团。这一集团一方面利用清政府倡导的新政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从而控制和垄断国家的经济;一方面依靠封建朝廷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而迅速成长起来,因此,他们要维护封建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秩序。在 20 世纪初期,这个集团成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镇压民主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

中国传统的社会正在日趋解体,原有的社会现状已经无法保持下去,可是,替代它的新兴的社会力量还远不成熟。这一点,不能不给 20 世纪初年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带来许多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特征和弱点。

五、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孙中山,原名文,字逸仙。后来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化名中山樵,人们就称他为孙中山。

1866 年,孙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翠亨村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离澳门只有 37 公里,和香港隔水相对,同海外的交通比

较便利,但本地背山濒海,土质硠瘠,生活贫困,因此不少人到海外谋生。孙中山的祖父是一个没有土地的佃耕农,父亲租种别人的几亩田地,还兼充更夫。孙中山从六岁起,就跟姐姐上山打柴,去园地拾猪菜。再大一些,就下田插秧、除草、挑水、放牛,从事各种劳动。十岁起到村里的私塾读书,放学后仍要到田里劳动。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很穷,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至挨饿。他幼年……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们的主食是白薯。”那时,他的家乡还有散落民间的太平军老战士,常对他们谈当年太平天国的故事,并且用做“洪秀全第二”来勉励孙中山。这些,对童年的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孙中山只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确实最多也只能成为“洪秀全第二”。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孙中山所出生的时代,中国近代工业已开始出现,在海外华侨中也出现了一批华侨资本家,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大哥孙眉。

孙眉少年时代也在家乡帮助地主做长工,因为生活贫困,1871年应夏威夷政府的招募,出国赴檀香山做华工。孙眉到那里先做农业工人,积了

一些钱后独立开荒,经营农场,开办了牧场、商店、兼营酿酒、伐木等业,发展成一个农牧业资本家。1878年7月,孙眉派人把他的母亲和孙中山接到檀香山居住,孙眉寄回的钱也逐渐成为孙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孙中山的父亲不再当更夫,有了土地,而且雇工帮助耕种。这样,孙中山家庭的经济状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孙中山在夏威夷五年,依靠哥哥的资助,先后攻读了英国教会和美国教会办的两个中学校。五年的国外生活和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朦胧地感到,自己有责任,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来“改良祖国,拯救同胞”。1883年,十七岁的孙中山重返祖国。当他重新接触到清朝封建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时,自然格外敏锐地感到这个政府的腐败和贪婪,深切地感到这一切无法容忍。

1884年,孙中山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拔萃书院和域多利书院攻读,继而又转到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在西医书院时,孙中山常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放言高论,被亲友们称为“清廷四大寇”,因为他们敢于讲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言论。

1892年,二十七岁的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广州行医。1894年夏,他和少年好

友陆皓东一起到北方游历。他们由广州过上海到天津。在上海,孙中山见到了当时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和王韬。王韬给孙中山介绍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孙中山到天津后,通过这个幕僚送给李鸿章一封他临行前就写好的长信。

孙中山在这封信里,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解除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但是,李鸿章的态度却极为冷淡。那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得到他的上书,只是随便说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返回南方。

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往往需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特别是一种新思想的产生,要冲破社会上许多传统思想的束缚才能走上一条畅通的大路。一个知识分子要抛弃自己取得的那点社会地位,冒死领头革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望以后,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反抗清

朝政府。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又重到檀香山。11月24日,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和孙眉的帮助,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而且影响深远的口号,就是在这时第一次提出来的。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是孙中山起草的。他大声疾呼,指出当时的民族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忍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来到香港。他找到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并同杨衢云等原来在香港成立的辅仁文社联合,于2月21日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香港兴中会章程中的政治主张比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要激烈得多,对清朝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当时国内“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还明确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要求会员为推翻清政府和建立资产阶

级共和国而斗争。这标志着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起了第一个能够采取革命实际行动的战斗核心。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的第二个月，孙中山就和杨衢云等在香港集会，准备发动广州起义。这年秋天，准备工作就绪，决定联络会党、游勇和绿林，10月26日（农历重阳节）发动起义。由于有人告密，广东官方首先发觉，破获了起义的机关，查到了从香港偷运到广州的枪械，起义被破坏了。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和参加起义的会党头头丘四、朱贵全等人被捕后遭到杀害，孙中山幸能逃脱。陆皓东亲笔写下的供词说：“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代而起者不可尽杀”。他们是中国革命民主派中第一批流血牺牲的烈士。他们热爱祖国、宁死不屈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

清朝官方悬赏缉拿这次起义的为首人物。孙中山的名字在通缉文书中写作“孙汶”，表示这是洪水猛兽一般的人。1896年，清朝官方侦察到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原来孙中山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即由香港赴日本，日本报纸刊登消息，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从此即沿用了“革命党”这一名称。不久再回檀香山到美国，又转到了英国。清朝驻伦敦的使馆设计逮捕了孙中山，

藏在大使馆内，准备把他偷偷押运回国。由于他的朋友原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的营救，才得以脱险。经过此事，孙中山在国际上开始作为中国革命家而驰名。在国内，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的榜样为越来越多的爱国者所敬重，特别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当人们对祖国的命运的焦虑和对清政府的愤怒越来越强烈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越发被人重视，孙中山开始成为国内人们心目中“革命党”的象征。

六、革命党力量的集结和发展

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已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受过比较完整的西方教育的近代知识分子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壮大了力量，开始了他们政治理想的追求。当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最初在国内时还应者寥寥，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这种社会力量在中国仍太微弱。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间有了显著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留日学生人数的猛增。1902年是留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的一年，达到五六百人。不少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如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杨笃生、周树人（即鲁迅）等，都是在这一年到达日本的。1905年，留日学生增

加到八千人。这些留日学生充满着爱国救亡的热情，革命化的倾向很快就表现出来了。

1902年4日，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等在东京发起举行轰动一时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同年冬，留日学生中的一些激进分子组成“青年会”。会章明确规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最早的会员有秦毓蓀，叶澜、冯自由、张继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陈独秀，他那时的名字是陈由己。

1903年春夏之交，留日学生中爆发了拒俄运动。为了抵制沙俄占据东北的计划，留日学生组成拒俄学生军，提出要隶属在袁世凯麾下从事抗俄。但清朝政府却下令加以镇压，密令地方督抚：遇有行动诡秘、有革命之心的学生，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由日本归国的学生军特派员二人在天津也被清朝官吏杀害。

这件事对留日学生刺激很大。一大批原来并没有“革命之心”的留日学生，在清王朝倒行逆施的驱迫下，丢弃了对它的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拒俄事件后，整个留日学生中的政治空气同以前截然不同。留日学生各种刊物公然鼓吹反满，公然提倡流血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如何进行反清革命，成为留日言论界的中心话题。这以后不久，一

部分留日学生回到祖国，开始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其中，黄兴、宋教仁等回到湖南，龚宝铨回到上海，分别成为国内两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和光复会的发起人。

当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进入高潮时，革命思潮在国内正迅速高涨起来。这个高涨的起点，是刚从日本归国不满十八岁的少年留学生邹容写的一本《革命军》一书在上海的出版。

《革命军》这部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一打开这本书，劈头就可以读到邹容热情洋溢的对革命的赞颂：“巍之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像这样鲜明地高举革命的旗帜，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而又比较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的著作，《革命军》是第一部，鲁迅回忆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所做的《革命军》”。

邹容在这本书里，还系统地宣传了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他从国民的天赋权利这一观念出发提出问题，并且提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具体

方案。他在全书最后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像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和具体主张，邹容也是第一人。

《革命军》是秘密出版的小册子。1903年5月，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苏报》从原来刊登社会新闻的无聊小报转变为革命派的公开宣传阵地，使革命宣传的影响大大扩展。六月上旬，《苏报》连续刊载文章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还连载章太炎、柳亚子、邹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言词激烈，一切在所不顾。

《苏报》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引起清朝政府的极大惶恐。江苏巡抚恩寿令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沪领事发出照会，又向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工部局交涉，要求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6月30日，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7月1日，邹容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7日，《苏报》被封。清朝政府要求引渡章、邹两人到南京，以便置之死地。由于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拖延到第二年5月，由租界会审公廨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可是，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月，因受尽折磨，含冤而死，年仅二十一岁。章太

炎到1906年方出狱。

《苏报》案发生在上海，引起中国知识界极大震动。报上的文章直斥清朝皇帝为小丑，亲贵为贼徒，这只有在海外的日本和香港才能做到。清政府本来想借《苏报》案将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扑灭下去，结果却适得其反。清政府被迫在租界内同老百姓打官司，并且遭到章太炎等人的有力驳斥，顿时国内舆论大哗，清政府狼狈不堪，革命思潮则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年冬，参加拒俄运动后回国的湖南籍留学生陈天华，又写了《警世钟》和《猛回头》这两部震撼人心的宣传爱国救亡小册子。陈天华在这里把清朝政府直截了当地称为“洋人的朝廷”，号召人们万众一心，准备以最激烈的手段起来救亡，并且写道：“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纲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

《猛回头》、《警世钟》出版后，由于它的文字浅显通俗，充满爱国热情和扣人心弦的言词，它很快地流传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两湖各学堂和新军军营传播更广，对宣传反清革命，促进武昌新军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少年时代在湖南家乡也曾受过陈天华小册子的影响。

1903年春夏之交的拒俄事件和《苏报》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以后，留学生中的多数倾向革命，内地的革命思潮也迅速兴起。许多接受了革命思想的革命激进分子自动组织起来，组成革命团体。1904年，各种革命团体像雨后春笋一般，在内地建立起来。这些革命团体中最重要的有：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自强会，贵州的科学会等。

在这些革命团体里，出现较早、影响最大的，当推湖南的华兴会。它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是黄兴。黄兴是湖南善化人，1874年生，比孙中山小八岁。他的早期经历和孙中山不很相同：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受过较多传统教育，十九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到武昌两湖书院求学，1902年初，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到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1903年，他参加拒俄运动，以运动员的名义，返回湖南从事反清革命的策划。黄兴的这种经历，在国内知识分子群中有很大大代表性。他是个爱国的血性男儿，平时沉默寡言，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得到周围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黄兴回到家乡长沙，在明德学堂任教员。11月4日，他以庆祝自己三十岁生日为名，邀集了刘

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等十多位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商定成立华兴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对外采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并提出两句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华兴会成立后，立即联络湖南的哥老会的头领马福益，准备于11月16日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华兴会组织并不严密，再加上会党人众，又没受过政治斗争的基本训练，很快走漏了消息。劣绅王先谦向湖南巡抚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等人。于是长沙内外，清廷大事搜捕。黄兴、刘揆一、张继等先逃到上海，再去日本。马福益先避居湘西，后来在路过湘乡时被捕遇害。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光复会的成立，主要的推动者是留日的浙江籍学生。1903年10月，在东京的浙江留学生多次密商组织秘密革命团体。1904年，陶成章和魏兰在上海同曾任翰林院编修而这时倾向革命的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取得联系。随后，陶成章又芒鞋破衣，蓬头垢面，徒步日行八九十里，奔走于浙东，同各地会党联络，准备起义。同年10月，陶成章回到上海，会见了在这里组织暗杀团的龚宝铨。两人商议，组成一个革命团体，推声望很高的蔡元培为首领，以资号召。于是，光复会于这年10月在上海正式成立。1905年1月，徐锡麟到上海见到蔡元

培后也加入了光复会。徐锡麟入会以后，逐渐成为光复会实际上的领袖，光复会的活动重心逐渐移往浙江绍兴。

湖北的科学补习所的发起人是张难先和胡瑛，他们注重在军队中作工作，亲身到新军中去当士兵。1904年5月，他们同营中士兵以及吕大森、曹亚伯等人成立了“科学补习所”。由于他们同华兴会有联系，在华兴会的起义计划暴露时，他们也受到牵连，科学补习所被迫解散。它的成员后来又以“日知会”的名义组织起来。他们的组织对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有直接的关系。

综观这个时期国内建立的革命团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两湖地区的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江浙地区的光复会。连同原有的以广东地区为基地的兴中会，它们所在的两湖、江浙、广东这三个地区，正是国内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最发达、近代新式学堂最发达的地区。这些团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区性。华兴会常把自己称为“湖南团体”。光复会的会员大抵都是浙江籍人，如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许寿裳、鲁迅以及后来参加的章太炎、秋瑾等都是，而尤以浙江绍兴人为多。兴中会则绝大多数是广东人。

以上说明，一方面，国内那些经济文化比较发

达的区域出现了目标大体一致的革命团体；一方面，这些团体有着浓重的地方性和分散性，因此，联合各团体，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已经刻不容缓了。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不能不有一个可以凝聚各种力量在一起的中心人物。在这方面，孙中山有着其他人难以企及的优越条件：第一，他十年前就首倡反清革命，并因策划广州起义而遭清政府通缉。那时，国内还没有什么人懂得革命为何物。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时，孙中山在他们心目中就享有极高威望。第二，当时人们普遍渴望了解西方。而孙中山久居海外，已经环游全球数圈，对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和近代种种社会政治学说都有较深刻的了解，这也能博得许多人的景仰。第三，就孙中山个人来说，他有世界眼光，有对革命方略和目标深思熟虑的见解，有富于鼓动力的雄辩口才，又豁达大度，待人诚恳，很有吸引人的个人魅力。因此，他就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共同领袖，成为足以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美国经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来到日本东京。几天后，就同正逃亡日本的黄兴、宋教仁等相见。他在谈话中，有一

这段话很能打动宋教仁等的心：“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事、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第二天，黄兴、宋教仁等共同商议华兴会会员是否参加同盟会之事，会上虽没有作出结论，只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事实上华兴会在东京的会员除极少数人外，都决定参加同盟会。这样，就为中国同盟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7月30日，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东京召开筹备组党会议。这次会有七十多人参加，会上孙中山提议建立革命同盟会，经过一番争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宗旨。

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召开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是孙中山到日本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露面，也是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夜由它的领袖向群众宣布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

孙中山来到时，全场掌声四起。孙中山的讲演充满民族自豪感和革命必胜的信心，鼓舞了到会的每个人。他说：“中国要迅速发展，有许多有利条

件。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拒，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他热烈地号召人们下定决心，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孙中山的讲演充分满足了人们对他的殷切期待，他使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8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有几百人，除甘肃一省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各省的人都有。这次会议通过了由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还模仿西方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度，设立了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中国出现。从此，革命派以新的阵营和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舞台，开始了革命的新进程。

七、立宪派所追求的立宪运动

当革命党人的力量集结和壮大的时候，二十

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也在努力争取立宪，并在全国掀起一次又一次高潮。

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前身是维新派，其成员是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近代知识分子，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在戊戌变法时期，他们就准备登上政治舞台，由于维新运动的天折，维新派的政治目标未能实现，维新派志士或逃往海外，或惨遭杀害。但戊戌维新所引起的中国社会思想变化不容低估，由于维新运动中西学的广泛传播，新式报馆、学会、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改变了传统士大夫的封闭心态，新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透射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内心世界，从而形成了立宪派这一政治团体。

同维新派相比，立宪派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基础。随着清末新政和宪政运动的开展，士大夫阶层发生重大分化，其身份、职业日趋多元化。过去，他们的政治活动大都在官场、科举场所和旧式书院，而新政开始后，他们的活动则集中于都市工商界、新式学堂、社会团体和新式报馆，其身份由单纯的地方绅士和旧式士大夫转变为开明绅士、近代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

从立宪派首领张謇和梁启超的社会经历可以看出立宪派从旧式士大夫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的

普遍历程。

张謇出生于江苏，十六岁中秀才，受到两江总督沈葆楨的特别赏识；其后，他到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当了文书，随军到过朝鲜。1894年他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与朝中大官僚翁同龢关系甚密。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张謇认识到学习西方科技、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从1895年开始，张謇开始兴办新式企业，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扶植下，1899年他所创立的大生纱厂正式出纱，张謇由此走上了实业家的道路。

梁启超亦出身科举，少年时中举，青年时代直接参加了戊戌变法。逃亡到日本后，他广泛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他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资产阶级立宪政治，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思想领袖。

除此以外，各省的立宪派首领如汤寿潜、蒲殿俊、谭廷闿、汤化龙、孙洪伊等人，都有类似经历。他们大都是地主兼资本家，又在清朝官场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地位。这种亦官亦绅亦商的状况，决定了他们反对革命、主张立宪的政治态度。

1903年国内的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相互商讨了立宪问题。1904年张謇代两江总督魏光燾拟请立宪奏稿，又写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

世凯，劝说他们奏请立宪。同年，《东方杂志》、《大公报》、《时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乞求清朝政府约定设立议会之期，实行君主立宪，制定国家宪法。一部分汉族官僚为了消弥革命并从清政府分夺权力，也跟着叫嚷起立宪。1905年，清驻法公使孙宝琦奏请改革政体，接着署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先后奏请立宪。这些掌握清朝地方军政实权的地方官僚支持立宪派，确实对清朝政府形成了一定压力。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潮流和声势强大的立宪运动，慈禧太后居然同意考虑立宪问题。1905年10月，清朝政府决定派“五大臣”到外国“考察政治”，为“将来实行立宪作准备”。1906年，由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提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消息传出，立宪派欣喜若狂，如猿得芋，闻声起舞。同年十二月，张謇联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官僚、名士、资本家，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接着，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廷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立逢甲等在广东成立自治会和清政府一唱一和，遥相呼应。

1907年，流亡在东京的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制造舆论，摇旗呐喊。立宪派们以为清政府从此真正会革新政治、实行立宪，中国从此会走上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道路，一时间，朝野欢呼，上海等大城市各界均举行庆祝典礼，悬旗演剧，盛极一时。

然而，清政府在宣布“预备立宪”后，并没有新的动作，实际上是为了抵制革命，实行皇族集权。立宪派看到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深感清政府动作太慢。1908年6月，张謇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致函全国立宪派头面人物相约齐集北京，恳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康有为在海外联合二百余埠华侨，上书朝廷；梁启超则主持政闻社致电清政府，明确要求清政府在三年内召开国会。8月，各省请愿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交国会请愿书，他们联络近四万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以显示他们的声势。这一下引起了清政府的愤怒和恐慌。于是，清政府采取了杀鸡给猴看的手法，说政闻社“良莠不齐”，下令查办，严拿康、梁党徒。立宪会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1908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以后正式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同时还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

力,宪法对封建专制政体没有任何改变,“预备立宪”不过是一纸空文的空头支票。立宪派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深感失望,梁启超向清廷痛陈道:“宪政的成立与否,关系数千年国家的存亡和数万万国民的生死,现定九年预备期,这不过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他要求清政府“庶几改正”。张謇等人也纷纷指责清政府,要求它拿出实际行动,缩短预备立宪期限,速开国会。他们四出活动,准备再次苦谏。

八、北洋集团势力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年,当革命党和立宪派正为他们各自的理想而独立苦斗的时候,以袁世凯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集团势力已在中国悄然兴起。谈到北洋集团的兴起,首先需要说清楚袁世凯个人的发迹史。

袁世凯于1859年出在在河南项城农村,他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封建教育,热衷科举,志在做官。当捻军起义席卷豫东时,袁氏家族在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的带领下,纷纷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由于绞杀农民起义有功,袁甲三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恒、袁保庆等,分别取得了漕运总督、侍郎和道员的官位。袁世凯幼年就受家庭环境的影

响，一心想依附皇朝求取高官厚禄。

青年时代，袁世凯跟随叔叔袁保恒和袁保龄到了北京，一边学习八股文，一边帮叔叔办事，对官场上贪污受贿、行奸作伪、攀附权贵、奔竞钻营都深有领会。1881年，袁世凯投靠了淮军统领吴长庆，走上了以军功博取官位的道路。此后，他随吴长庆驻军朝鲜，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过程中，袁世凯立了大功，受到李鸿章的器重。1885年，在李鸿章保荐下，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在朝鲜，袁世凯不仅吸取了洋务派的政治外交经验，还观察到日本军事的强大，产生了改良中国军事的想法。1895年，当袁世凯受命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时，他就把封建主义思想和军事改革思想一同注入了这个新的军事集体，从而形成了北洋军事集团。

北洋军事集团由以下三部分人构成：即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将。这些人大都生长在清王朝封建政治文化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有着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特别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着坚定的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政治追求。由于在淮军中不受重用，升迁甚慢，他们在心理上受压抑感很重。这些人一旦受人

识拔,就会产生强烈的为个人所用和报恩的思想。袁世凯知道这些人的追求所在,他先后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炮队统领、步兵学堂监督等职,令他们施展抱负,发挥才干,使这些人为己所用。

袁世凯对新建陆军中的原家兵家将和淮军旧将亦加笼络和提拔。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军籍世家和北方农家,他们当中认字者甚少。袁世凯曾私下对人说:“他们毫无知识,只需优待他,他自然会竭诚受我驱遣的。”由于袁世凯掌握了他们的特性,一方面以官位利禄和小恩小惠笼络之,另一面又以严刑峻法威慑之,使他们怀德而畏威,视袁世凯为天帝神明,报之以服从和愚忠。由于新建陆军各级军官的官禄升降都由袁世凯的喜怒而定,他们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转移到袁世凯身上。

经过袁世凯的选拔和培养,以他为中心的北洋军事集团初步形成,他们的势力随着袁世凯权力的膨胀而扩展。

1901年,袁世凯受任直隶总督,他的政治野心逐渐扩大。他开始招揽各种政治人才进入他的集团,从而形成了北洋官僚集团势力。

首先,袁世凯利用政治亲缘关系来网罗他的政治势力,他所任用的亲信大都是亲朋、同乡、同

僚、部属、门人、恩人、结义、姻亲等。徐世昌堪称北洋官僚集团的幕僚长。早年与袁世凯“互相倾服”、结为异性兄弟。后来徐世昌考中进士，做了翰林院编修，可官小职卑，俸禄很低。袁世凯多次向清廷“保荐”他，使徐世昌从此平步青云，官至邮传部尚书。因此徐世昌视袁世凯为知己。

唐绍仪是袁世凯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之相识的。由于唐绍仪曾冒死护送过袁世凯，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后，立即保荐他为邮传部侍郎，掌管全国铁路交通。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继续以官位利禄为诱饵，网罗各种政客、文人、理财家。杨士骧、杨士琦、赵秉钧等人就是在官禄利诱下，同袁世凯一拍即合，进入袁世凯集团，以其政治经验和才干为袁世凯效力。

袁世凯还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己的势力。清王朝末年，官场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袁世凯在早期政治实践中就了解金钱的作用，他深知权力同利益在一起，有权力即有金钱，利用金钱又可换取更大的权力。早在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就以大量金钱孝敬荣禄，受到荣禄的提拔和庇护。奕劻入军机后，袁世凯又以十万两银子作贺礼。以后无论庆府的年节、生日、请客、婚嫁，都由袁世凯预

先布置,不用王府一钱。通过金钱,袁世凯陆续使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总管李莲英等清廷内重要角色纳入自己的集团范围内。

袁世凯还善于利用政治投机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清末社会,改革潮流澎湃,袁世凯就以“开通风气”自诩,屡次上疏言新政,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1900年,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后,他委派周学熙等人,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劝业场和银元局等官办企业,鼓励扶植绅商投资办厂。袁世凯还十分注重市政建设,在天津建立公园、植物园,设立电灯、自来水。在他就任直隶总督的六年中,“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袁世凯通过举办新政,网罗了一批实业家和理财家,扩充了北洋集团的经济实力。也博得了北方资本家的信赖和支持。

1907年,全国立宪运动出现高潮,袁世凯也由主张“预备立宪”的渐进派,一跃成为“急进派”,奏请清廷“赶紧实行立宪”。特别是当清廷逐步限制他的权力时,他更是向立宪派首脑人物暗送秋波,屡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由于袁世凯以北洋大臣身份主张立宪,国内立宪派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坚,在人们心目中,袁世凯俨然成

为“全国立宪党之魁。”由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以立宪相标榜，对国内外立宪派都有很大影响。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回国后，纷纷投到袁世凯幕下效力。

袁世凯通过创建新建陆军、编练北洋新军、举办亲洋新政，使北洋集团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从直隶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实力集团。

这一集团势力以个人利害关系相维系，以个人的政治利害得失、官位利禄追求为人生目标，其成员大都视袁世凯为“衣食父母”，有着强烈的结党营私的团体意识。这一集团的利益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并要维护这一阶级的统治秩序。

辛亥革命爆发前几年，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已发展成对全国局势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集团势力，它的形成和发展对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和立宪运动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九、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立即把全力投入到武装起义的发动之中。

孙中山认为，当时全中国已如一座“枯木之

山”，只要有“一星之火”就可使革命烈火燃烧起来。在同盟会存在的整个过程，他们直接发动的武装起义几乎没有停止过。主要有：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州“三·二九”起义。孙中山曾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的失败”，也就是领导了十大起义。这十次起义不包括自发性较大的萍浏醴起义，第一次和第二次是指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第三次到第十次都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由孙中山或黄兴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这一连串的起义，都是同盟会领导人苦心筹划的，最终却都失败了。这些起义为什么不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会党和军队都没有在下层群众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胡汉民认为会党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恃，它的首领又很难驾驭，今后当注全力于正式军队。此外，这些起义大都在两广地区发动，起义力量分散，不可能影响全国的局势，很容易被清政府扑灭。

尽管这些起义失败了，但它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次又一次起义的消息在国内传开，引起众多人们的关注，那些对清朝政府已完全失望的人们受到巨大的鼓舞，越来越多的人走上革命道路，

正如孙中山所说,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

就在同盟会领导华南武装起义的同时,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光复会也在紧张地筹划着武装起义。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来校主持典礼。革命党人徐锡麟想凭借他的巡警学堂会办的身份,乘机发难,夺取安徽。当学生在操场集合后,恩铭来到操场礼堂。徐锡麟突然上前向恩铭行举手礼,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愕然,说:“徐会办从何得此语?”话音未落,徐锡麟的助手陈伯平就上前投出炸弹,没有爆炸。徐锡麟立即从靴统内抽出手枪,双枪向恩铭射击。陈伯平和徐的另一助手马宗汉也连开数枪。恩铭连中七弹死去,文武官员立刻作鸟兽散。徐锡麟率领学生迅速占领军械局,准备开仓举行起义,结果被赶来的清军包围,双方激战六小时,徐锡麟等二十余人被捕。在刑场上,徐锡麟自称是革命党首领,慷慨陈词,视死如归。当晚,徐锡麟被剖腹剜心而就义。

安徽徐锡麟的起义失败很快牵连到浙江绍兴大通学堂,这里是光复会在绍兴的重要据点,女革命家、同盟会浙江主盟人秋瑾正在这里主持校事。

她还没来得及响应安徽的起义，浙江巡抚张曾敫就派兵包围了大通师范学堂，秋瑾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学生掩藏枪弹，焚毁名册，暂时走避。别人让她也躲离绍兴，秋瑾则坚持不走。她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前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7月14日秋瑾等六人被捕，秋瑾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一字未吐。绍兴绅士章介眉等同绍兴知府贵福商议，虽无口供，仍定罪处斩。临刑前，浙江巡抚曾向浙江立宪派头领汤寿潜征询意见，汤寿潜却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说：“这等人，不杀何待？”翌日黎明，秋瑾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下，时年三十一岁。临刑前，她看到革命胜利前全国一片黑暗，祖国在危难中呻吟，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

秋瑾的死，在全国造成极大影响。因为她是中国第一个为民族民主革命流血的女革命家，更博得人们广泛的同情。清政府连一个弱女子都要杀害，更激起全国人们的愤怒，从此更加孤立。秋瑾的英烈榜样，激励着许多人走向革命。现在，在杭州西湖边，仍然竖立着秋瑾的塑像和墓碑，让后人凭吊。

十、清王朝覆亡前的大混乱

当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立宪运动汹涌澎湃的时刻，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却陷入了极度的混乱，无法继续照旧统治下去。

1908年和1909年之交的两个半月内，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接连发生两件震动内外的重大变动：一件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11月14日和15日两天内相继死去，另一件是袁世凯被放逐。这两件事，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陷入一片混乱，整个政局变得更加动荡不定。

光绪皇帝的死有点不明不白。由于他并没有实际权力，因此对当时政局没有大的影响。但他死的第二天，西太后死去，这影响可就大了。四十多年来清朝政府至高无上的大权一直由她独揽。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她最富有反动统治经验和权术，能够驾驭内部各派势力。她死后，清朝统治者内部再没有人能填补她的空白。这使本来已日趋走上绝境的清朝政府更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

12月2日，溥仪即位，宣布明年为宣统元年。第二年1月9日，发布上谕说：“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难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痾，以示体

恤之至意。”这一举动使中外都为之愕然。

袁世凯长期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一手练成当时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北洋六镇，朝野内外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北洋集团势力，又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重视和支持，权势炙手可热。清政府感到犹如猛虎睡在卧榻之旁，生怕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西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更感到他难以驾驭。他们最初想把袁世凯杀掉，又怕引起外国列强和袁世凯旧部的强烈反响，只得以“足疾”为名，将他放归家乡河南。

清朝皇室本打算借此来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然而，当权的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在统治经验和能力上远不能同西太后相比。袁世凯被罢斥后，满朝大臣中没有一人能替代他的作用。北洋集团成员自然增强不满，而清皇室因害怕他们的势力，又进一步加以裁抑：将段芝贵等参革，曹锟退休，段祺瑞调充江北提督。这使北洋集团势力更加离心离德。此外，袁世凯被放逐后，朝中再没有一个汉族大臣起缓冲的作用，加剧了满汉之间原本很大的矛盾。这一切使脆弱而孤立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更加分崩离析。

到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中国社会也陷入大混乱。清末财政危机，以大借外债、征收苛捐杂

税、滥铸铜元、滥发纸币度日，导致了全国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信用破产。一时间，全国银行、钱庄倒闭，工厂破产，民族工商业者惶惶不可终日。

1909年和1910年，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五省连降暴雨，江水猛涨、冲毁堤岸，造成洪水泛滥，许多地方粮食颗粒无收，饿殍遍地，粮价暴涨，光湖北一省就出现数万饥民。湖南长沙出现抢米风潮，清政府则出动军警镇压，打死贫民十四人，打伤四十多人。于是，民众愤怒无法抑制，自发地聚集起来，焚烧湖南巡抚衙门，接着又捣毁或焚毁许多外国洋行和外国轮船公司，造成极大震动。

遍及全国各地的抗捐抗税斗争更是此起彼伏，延续长久。拿莱阳民变来说，由于铜元贬值，捐税繁重，民不堪负。乡民在曲诗文带领下聚众抗捐，相聚自保，最多时达十五万人。清政府不是缓解百姓情绪，降低捐税，而是调重兵镇压，发炮猛轰，乡民死伤千人。全国的老百姓对清王朝的统治者都恨之入骨，“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全国民众的反抗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异常动荡的局势。众多的人都预感到清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身居海外的梁启超也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状况。他在《国风报》上写道：“十年前号称殷富之区，今日则满目萧条。而商号破产，日有所闻；金融紧迫，无地不然。自上而下，皆有僥然不可终日之势。盖晚元晚明之现象，一一皆具见于今日。悉惨之气，充满中国。凡百险状，盖未有过此者矣。”在这种“土崩之势”，社会即将大动荡到来的情况下，梁启超号召立宪派全力行动起来，防患于未然，挽狂澜于未倒，避免国家的灭亡和革命的发生。于是，立宪派又作出自己最后的努力，先后掀起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十一、立宪派发动的速开国会请愿

1909年10月14日，全国二十一省的谘议局同日开幕，立宪派以谘议局作为合法的基地，进一步开展活动。这时，清王朝大崩坏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抱着孤臣孽子之心的立宪派忧心如焚，他们还想“补天”，期待清政府能在一定变革的基础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于是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11月27日，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到达上海，决定组成代表团晋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请愿主旨在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1910年1月中旬，各

省代表三十二人到达北京，请愿代表由孙洪伊领衔到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提出危局严重，要求一年之内召集国会。清廷对召开国会心有疑惧，又觉得九年之期已写入煌煌上谕，不可更改。在这种心理下，他们一面称赞请愿者“爱国热忱可嘉，朝廷深为嘉悦”，一面又表示九年之后一定召集议会，实际上是拒绝了立宪派的请求。

立宪派对此并不死心。5月初，各省国会请愿同志会先后成立，请愿代表再次赴京。这次请愿代表不仅来自各省的谏议局，还有商会、教育会、政治团体、华侨、宗教团体的代表。6月初，入京请愿代表已达一百五十人，号称代表三十万人。在请愿代表上载泮书上写道：“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继，如燎方扬。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术乎？”

清廷这次态度比上次不客气多了。它申斥请愿代表说：“难道议院一开，国家就能收全治之功，古今中外亦无此理。”宣布：“等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

清廷的态度无异像一盆冷水浇在立宪派人士的头上，许多人极为愤慨，广泛征集签名，准备再举。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长文指出：“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

于此一二年之间”“吾敢断言说：中国如有国会，在宣统四、五年以前为能有之，过此以往，吾中国将永无开国会之时。”他又说：“国民如果好虚名，又何必争此区区数年的岁月？国民所哀号再三者，不过是因为以现今的政治组织不改，不出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这些言论和行动，预示着即将进行的第三次请愿将更加激烈。

8、9月间，各省谏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开会，有些代表提议不开国会就不纳税，情绪比前二次更加激烈。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团二十多人将请愿书送到摄政王府，然而遇到的仍是冷冰冰的接待，肃亲王善耆出来代为接受，答应转交。

10月22日，朝廷认可的全国性民意机关资政院开会讨论陈请速开国会议案，会场上出现前所未有的热烈场面。会议通过专折，要求朝廷“明降谕旨，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以维危局而安群情”。

三天以后，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全国十八省督抚联名致电军机处，请求代奏，电文写道：“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光绪皇帝）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即使内阁、议会近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恳请皇上圣断，立即组织内阁，宣明年开设国

会”“宗社幸甚，民生幸甚！”十八省封疆大臣联名上奏非同小可，这说明他们身处地方，比朝廷更实际地感受到全国危机的严重性。

清廷面对这种情况，感到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就会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对统治不利。但他们筹划中的皇族内阁尚未建成，一旦召开国会，会受到许多牵制，他们还担心答应太爽快，仿佛朝廷不能作主了。最后决定：将召开国会的期限缩短三年，改在宣统五年开设。

这道上谕发布后，立宪派内部产生分化。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立宪派认为请愿已取得一定成果，可以就此收场。于是，致电资政院，祝贺国会提前召开。而东北三省和天津的代表12月又一次赴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这次毫不客气，将东北请愿代表强行押送回籍，将天津学界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至此，立宪派发动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只得宣告结束。

请愿速开国会运动的失败，说明了清王朝的腐朽和保守。指望这样一个腐朽的政府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无异于梦呓。在清末全国危机总爆发的前夜，清廷本应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顺应民意，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避免革命的爆发。可是腐败到极点而变得异常愚蠢的清政府连立宪派这些忠

告也听不进去，硬是加以拒绝，把许多原来抱着孤臣孽子之心还想帮助它维护统治的人从自己身边推开了。通过这一运动，清廷的反动而腐朽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人们终于破除了对它的幻想，不惜作出重大牺牲，用革命的手段推倒它，使历史继续前进。

立宪派本想通过这次运动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加固这座早已腐朽的大厦，结果却适得其反，使原本极端孤立的清朝政府更加孤立，加速了革命的爆发。这同立宪派原来的主观愿望是截然相反的。

十二、黄花岗起义

在这个大动荡的年代里，同盟会仍然集中力量从事反清武装起义，起义的地点选在华南重镇广州。

191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起义的枪声又在广州城头打响了。黄兴率领同盟会敢死队员一百二十余人，吹响海螺，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勇猛冲入督署。这时，两广总督张鸣岐闻讯逃往水师提督衙门，留下的只是一座空房，起义部队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较高级的官员。黄兴下令焚毁督署，将部队分为三路，企图冲到城外，同新军和巡防营

中预定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力量会合，他们在城里却遭到了开来的清军的四面阻击。起义队伍左冲右突，孤军奋斗。黄兴打掉了两个手指，腿脚负伤；朱执绻胸部负伤，仍坚持战斗；而方声洞、林觉民中弹被俘。在激战中，起义队伍被打散，三五成群，各自为战。城外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根本没收到起义的通知，当他们听到起义发动的消息后，各位同志只能登高探望城中火势，大喜过望，由于手中没有弹药，又没有联系，只能相对疾首，看到火势渐低，全都垂头丧气。结果是城内的起义同志望城外，新军的同志望城内，双方都饮恨无奈。

结果，一百多位起义的同志孤军战斗，进行了彻夜的巷战，有的饮弹身亡，有的负伤被擒，黄兴等人负伤后躲藏起来，逃出了广州城。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参加起义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得十分英勇，林觉民、喻培伦、宋玉琳等人受伤被俘，都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林觉民是福建籍留日学生，在赴广州参加起义时，给妻子陈意映写下绝笔书，其中写道：“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

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而不顾汝也。”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文字所表达的爱国热忱、高尚情操和革命决心，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强烈地扣动我们每个读者的心弦。在这次起义里，先后牺牲八十多人。广州人民激于义愤，不顾清政府的迫害，冒着生命危险，收殓了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由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崇高理想和英雄事迹很快传遍全国。他们中很多都是留日学生，为了拯救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前程，从容赴难，明知失败而一死以报国人，对全国人民都起了巨大激励作用。正如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

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止,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十三、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全国政治形势表面上死一般沉寂。同盟会为了这次起义动员了自己所能动员的最大财力和人力,和清廷决死一战。它的失败使同盟会失去了很多骨干分子,元气大伤,同盟会许多领导人因此而意气消沉。但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短暂的沉寂只是这场久已酝酿的社会大地震之前的瞬间,随着一道划破苍穹的闪电,大地就会开始震颤。这道闪电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

前面说过,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争夺投资的集中点是铁路和矿山,许多爱国者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要控制中国的命脉,吸干中国的血液,因此,国内掀起了一股筹设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自修铁路的热潮。

1911到5月9日,离广州黄花岗起义只有十二天,清朝政府悍然宣布全国铁路干线的国有政

策。这一政策一宣布，四川和两湖地区的保路运动随之而起。

清政府在这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时刻，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冒天之下大不韪，作出这样导致严重后果的决定，不是太愚蠢了吗？原来，这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已使它无法解脱，在民穷财尽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举借外债，哪怕是饮鸩止渴也好。但借外债必须有抵押品作为担保，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铁路。由于粤汉、川汉铁路原来都答应允许商办了，要签定巨额的借款合同，先决条件就是得把铁路收归国有。这样，清朝政府就不顾一切地蛮干了。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授权庆亲王奕劻组织责任内阁，所任命的内阁成员名单是：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满）；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内阁成员中满人就占九人，皇族又占五人，一时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本来要求召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来限制清廷的行为，而清廷却

以满州亲贵全面控制政权回答了立宪派,这种明目张胆的欺骗人民、分赃政府的行为,惹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就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实际上是转手将铁路交给了帝国主义列强。这道上渝一出来,把清政府历年来在铁路对商民的承诺顿时撕得粉碎。这种赤裸裸的强盗式的掠夺,就像一根火柴点燃了四处的干柴,立刻燃烧起燎原烈火。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到会者有五千人,会上群情激昂。会议进行中,忽然有人站起来流着眼泪说:“铁路完了,四川也亡了。”说完就大哭起来。会场上顿时哭声一片。有的人一面拍桌子,一面踢脚,吼得屋瓦都震动了。照顾会场的警察也丢下警棍,伏在桌子上大哭。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人集体到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请政府收回成命。

王人文看到四川保路运动迅猛激烈地展开,深感事态的严重,担心要危及统治,上奏清廷暂缓接收铁路。清政府却申斥他对群众镇压不力,下令将他撤职,派素有“赵屠户”之称的刽子手赵尔丰

继任四川总督，制止保路运动。此外，清廷还让盛宣怀收买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将未用的川汉铁路租股现金转交清政府使用。四川全省群情激愤，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清政府还一再火上浇油。很多人都说，政府要来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立刻决议罢市。

8月24日，成都人民大罢市，学生大罢课。很快，罢市浪潮波及全省。9月1日，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会又决议：“自本日起，不为政府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再上交。”这对清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面对四川人民万众一心抗争，一筹莫展，他生怕强行弹压，会激起更大的反抗。但清朝统治集团对保路运动采取镇压态度，传旨申斥赵尔丰，赵尔丰被逼得毫无回旋余地，只有铤而走险。

9月7日，赵尔丰谎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邀请谘议局、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蒲殿俊、罗纶等人到督署商议，罗纶等人一到督署就被逮捕。消息传开，数万群众来到督署衙门前和平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当晚，有一千多人，一堆一堆地涌入辕门，冲到大堂檐下。赵尔丰叫人传话：“快退下去，

再冲一步,就开枪了。”群众不听,继续向大堂冲去。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一排枪响过,三十多名无辜群众倒在血泊里,死难三十多人,受伤者无计其数。

成都血案发生后,四川人民的愤怒再也遏制不住了,革命党人乘此鼓动,四川保路运动立刻转入群众武装暴动。

9月7日当天,革命党人龙鸣剑、朱国琛等立刻到城南农事试验场裁成木板数百块,上面写“省城业已发难,望各地速起救援”,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中,顺流向下。这些革命党人称作“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了川南、川东各地,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总数不下二十万人。

9月8日清晨,第一支保路同志军华阳秦载麇所部开抵成都东门外。很快,成都西南新津的同志军挺进成都南郊,在红牌楼同清军发生激战。成都西北郫县同志军开抵成都西门。成都东北广汉、绵竹的同志军切断了成都经剑阁同陕西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成都的四面包围。川督赵尔丰向清政府惊呼:“川亡就在旦夕了。”9月25日,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这是革命党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它比武昌起义

建立的政权早三个月。

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是中国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到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地步，对全国的震动是巨大的。清王朝已经开始感到，它自认为牢固的统治地位开始摇晃起来。四川保路运动像一根燃烧的导火线，全国本来已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陡然更加紧张，紧接着，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夜空。

十四、武昌起义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当时，它仅次于上海，是全国第二大城市，被称为东方芝加哥。这里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人们无论对时局的了解，对新思想的接受，都能得风气之先。湖北的新军在南方各种新军中是最精锐的一支，新军以西法操练，征兵标准是以能识字为原则，一般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就投入新军当兵，因此，湖北的新军文化程度比较高，家庭较贫困，军队中的生活很苦，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在起义前夕，由于长江中游连年水灾和铁路收归国有的刺激，士兵的情绪处于极度的不稳之中。而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新军中进行着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当革命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

地坚决发动了起义。

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在二十世纪初年便开始了,最初出现的是一些革命小团体,如武库、科学补习所、群学社、日知会等。这些组织虽然屡次遭到破坏,革命志士们仍前仆后继,奋进不已。以后又先后成立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二十多个革命组织。到武昌起义前夜,逐渐汇合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随着铁路风潮的汹涌澎湃,文学社和共进会都积极策划在武昌起义,正是:黄花岗前,死气沉沉,而黄鹤楼头,又生气勃勃了。

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达成联合的协议,重新组成统一的领导机关。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11号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未来的军政府总理;决定在武昌小朝街设军事指挥部,定于10月11日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

就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开会的当天,发生了南湖炮队事件。南湖炮队革命党人较多,有些党人被反动军官注意,不得不请病假躲起来。许多党人为要走的同志设宴饯行,同志们喝得酒酣耳热,痛快

淋漓，笑声不断，被反动军官发现。革命党人怒而抗争，夺炮反抗，但炮无炮弹，于是弃炮逃走。这件事引起湖广总督瑞澂的重视，从此加强防范，戒备森严。

面对这一情况，革命党人经反复研究，决定起义按时发动。不料又出现了宝善里事件。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药，一枚炸弹突然爆炸，孙武身受重伤，被送进医院。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将革命机关所藏的旗帜、文告、名册、手枪、弹药全部搜走，并报告清朝当局。一时街上岗哨林立，侦探密布，形势异常紧急。

蒋翊武等闻讯立即紧急会议，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及时起义。当晚十二点，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夜里十一时三十分，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楼上，兴奋而焦急地等待南湖的炮声。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几个巡警随即破门而入，将革命党人包围。蒋翊武穿一件破长衫，没有引起巡警注意，在混乱中逃走，而刘复基、彭楚藩被敌人逮捕。这时，南湖的炮声却没有响。

原来，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的邓玉麟在途

中被军警扣住，邓玉麟千方百计逃脱后，不顾天黑路险，赶到南湖炮队，已过了十二点。炮队营门已关，玉麟翻墙而入，士兵们多已熟睡，猝不及备，因此只好放弃发炮。9日晚起义的计划破产。

湖广总督瑞澂抓到刘复基、彭楚藩，连夜开庭审讯刘、彭和另一个因送炸弹被捕的革命党人杨洪胜。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十分英勇，坦然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在法庭上大骂清政府的腐败，揭露瑞澂一伙的丑恶嘴脸，瑞澂被驳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只喊道：“杀！杀！杀！”刘复基道：“好！只管杀，我只怕你们也有一日呢！”他们在法庭上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10月10日清晨，瑞澂下令将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杀害。

三位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唤起了千百人站起来同清廷战斗。正如当时的革命党人胡石庵在《三烈士赞》中写道：“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三位烈士牺牲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就占领了武汉，四个月以后，穷凶极恶的清王朝就垮台了。

10月11日整天，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都十分紧张。瑞澂下达搜捕革命党人的命令，派军警四处搜索革命人的秘密机关，新军内革命党人处于

人人自危的状况。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平时不被人重视的小人物——新军士兵们，却挺身而出，工程八营的蔡济民、熊秉坤等约定当晚点名时发难，以枪声为号，并通知各标营响应，邓玉麟也答应一闻城里枪声，南湖炮队就发炮攻城。

晚上七点钟，熄灯号吹过，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工程八营。革命党人金兆龙把子弹推上了枪膛，二排长陶启胜听到动静，厉声喝道：“你想造反吗？”说着上前扭住金兆龙。金兆龙奋起反抗，扭打难分。革命党同志闻声赶来，程正瀛向反动军官开了一枪，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熊秉坤也赶来了，鸣笛聚众，宣布武装起义，接着向天空连放数枪。清脆的枪声划破黑暗的夜空，传遍了武昌城，各标营、测绘学堂的革命党人听到枪声都纷纷举枪响应，一时间火光冲天，枪声大作。驻防楚望台军械库的新军也开始响应，军械库很快被起义士兵占领。

午夜，城内响应起义的新军陆续来到楚望台，接受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的指挥。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进城。南湖炮队的同志拖着多门山炮入城，隆隆的炮声响起，起义军的士气为之一振。炮兵素称“军中之胆”，炮兵全营参加起义改变了武昌城内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南湖炮队的士兵将大炮架在城门和蛇山上，对准了湖广总督衙门轰击。参加革命的同志都知道，如果天明之前还不把总督衙门攻下，等待他们的就可能是掉脑袋。为了使督署目标更明显，革命党人在附近乾记衣庄同主人商量点火照明，主人慷慨答应，将所存衣被用煤油浇灌后加以燃烧，顿时火光冲天，督署目标被照得明亮，革命党人的大炮频频发炮。总督衙门起火，瑞澂丧魂失魄，命人打穿督署后墙，逃往停泊江面的楚豫号军舰。第八镇统制张彪率清军残部渡江退守。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局势。

天明时分，武昌已是另一个世界。革命党的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黄鹤楼上，满城士兵都是袖缠白巾，威风抖擞。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同武昌隔江相对的汉阳和汉口随即光复，武汉三镇宣告解放。

革命成功以后，怎样建立自己的政权，湖北的革命党人没有清醒的认识。湖北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是蒋翊武和孙武，他们一个逃亡在外，一个受伤住院，起义队伍一时群龙无首。起义虽有熊秉坤、吴兆麟发动指挥，但他们两人的威望和能力不足以担当起义胜利后的领导人。革命党人同谘议局的一些议员商量以后，决定准举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来当都督，成立

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开始不同意当都督，革命党人被迫将他关在楼上，由士兵看守。在以黎都督名衔出示的安民告示上，革命党人李翊东代他签了个“黎”字。布告贴出后，人们看到惊异地说：“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这在当时起了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震动了整个中国。10月15日，上海的《民立报》上发表于右任所写的短论说：“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竖革命旗！”“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吾昨日登吴淞口而俯视长流滚滚者皆血水也。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噫！革命党者，万恶政府下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立政府，欲救天下不乱而不得。”次日，该报头版又刊出“黎元洪小照”和“黎元洪小史”，武昌顿时成为全国万众瞩目的革命中心。

新的一页已经揭开，全国大起义的风暴终于随之迅猛掀起了。

十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立即得到各省的四起响应，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这个月余下的日子里

先后宣告独立的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五省。而这些省的相继独立，竟是连续发生在九天内的事情，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十月间宣布独立的六省中，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连成一块，山西、陕西连成一块，再加上同志军声势日盛的四川，七个省便彼此连接，在南方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湖北首义再不是孤立的。其它各省闻风后也跃跃欲试。清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革命浪潮向华东和华南迅猛扩展。

继武昌起义之后给予清政府第二次决定性打击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在11月上旬相继独立。东南地区，特别是江浙两省，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观瞻所系的重要场所。上海的独立，民族工商业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全国商团联合会手中掌握着一支原来用于维护地方治安的武装力量，上海商团总司令李英石率领商团偕同会党组成的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救出革命党人陈其美，光复上海。江苏的独立，先由上海革命党人到省会苏州策动，于是，新军入城，一律臂缠白布，排队到巡抚衙门请示独立，推巡抚程德全为都督。程德全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局势，只得表示同意。这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在武昌首义后第一个宣布独立并担任都督的，

这表明清朝统治集团已分崩离析到何种地步。

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是国内立宪派的领袖。当革命初起的时候,他还希望清廷能用“实行立宪”的办法,使革命风潮平息下去,他还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武昌起义。但形势的发展使他很快看清:革命浪潮已阻挡不住,如果坚持镇压,势必激起对抗的加剧,危及整个社会秩序。只有采取支持的态度,才能发挥立宪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他发表告江苏父老书,转而支持革命。由于立宪派态度的转变,革命阵营的力量更加扩大,这对进一步孤立清朝政府有积极作用。

和东南各省相继独立的同时,起义浪潮又席卷西南、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广东在湖北革命以后,人心思变,手握重兵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人到香港和同盟会南方支部胡汉民联系,胡汉民被邀请到广州,就任广东都督。这样的事在其它地方还不曾有过的,自然同国内局势的发展有关。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后,处在清朝控制下的只剩下南京一座孤城。11月11日,江苏、浙江、上海革命党人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南京。经过十天激战,终于攻克南京。南京光复,在当时是震动全国的一件大事,大大增强了人们对革命

取得胜利的信心。从此，宁汉长江流域连成一线，加强了革命的阵营。这样，南北对峙的局面终于形成。全国二十五省区中，已有十五省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了。

1911年12月初，宣布独立的各省，派代表到南京开会，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筹备成立临时政府的过程中，立宪党人、旧官僚向革命党人争权夺位，又互相争吵，斗争很激烈。正在这时，传来了孙中山即将从海外归来的消息。

当武昌首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虽然他长期被迫流亡国外，无法直接领导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但他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地位是人们所公认的，没有任何人能同他抗衡。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乘轮船回到上海，受到黄兴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的回国，给广大革命群众以巨大鼓舞，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党人开始重新活跃。

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等人以宴请孙中山为名，密商组织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并派人分途给各省代表做工作。29日，十七省代表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候选人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投票结果孙中山十六票，黄兴一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三分之二当选。消息传出后，南

京城内一片欢腾，各省军民纷纷集会庆祝。这样，孙中山便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十时，孙中山由上海乘火车赴南京，下午五点到达南京站。一时欢声震天，军乐齐奏，长江江面的军舰鸣礼炮二十一响。在数万群众的前呼后拥下，孙中山进入总统府，晚十一点，孙中山宣誓就职。他在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央临时政府很快就组成了。1月3日，代表会议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各部总长如下：陆军，黄兴；海军，黄鍾瑛；外交，王宠惠；内务，程德全；财政，陈锦涛；司法，任廷芳；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总统府秘书长为胡汉民，参谋总长由黄兴兼。孙中山宣布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充任参议员。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提倡振兴产业，保护私产；实行教育改革，将学

堂改称学校,对报纸实行言论开放;还限期剪辮,禁止缠足,提倡廉洁奉公等。这些措施虽未必能贯彻到底,但对移风易俗仍起着重要作用,使人们耳目一新。3月11日,临时政府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一律平等,有言论、结社、集会、著作的自由;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宣告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

然而,南京临时政府从它诞生起,就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它面临的最严重的困难是财政的极端匮乏,孙中山想借外债,以汉冶萍公司抵押,遭到舆论的反对。因此,财政问题无法解决。临时政府想举借内债,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但应者很少,无济于事。

军队的状况也十分令人担忧,除了少数以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乡失业民众,未受过军事训练,很难想象用他们打仗会取得什么样结果。更令人担忧的是:革命政党内部已陷入各自为政、分崩离析的状况,很多革命党人都急于结束这场革命,捞它

一官半职,享受到手的果实,革命党人内部争权夺利开始了。孙中山曾试图改组同盟会,发挥其中坚作用,但并未收到良好效果,改组后的同盟会在组织上更加涣散和庞杂。有些同盟会员竟处处与孙中山为难,事事反对临时政府,攻击孙中山为“理想派”、“权利主义者”。章太炎嘲笑说:“临时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日骑马上清凉山耳。”

表面上似乎声势夺人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竟是如此矛盾重重而又难以解决。它既不能使同盟会内部团结一致,又不能给人民群众以实际利益,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就必然导致它在中外反动派的猖狂进攻面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至最后倒下去。

十六、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完全慌了手脚。

10月10日,北京皇宫还传令嘉奖瑞澂“弭乱”有功,11月竟意外地收到瑞澂拍来的电报:武昌已被革命党占领。这真是晴天霹雳。从皇宫到满朝文武,都一片慌乱,许多大臣认为大局危在旦夕。

10月14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荫昌为第一军

军统，率两镇军队南下镇压革命党。而这时各地响应武昌起义的消息纷纷传来，清军由袁世凯一手训练，在湖北前线停滞不前，不听荫昌指挥。载沣感到亲贵督师并不能挽回大局，于是，他想到了袁世凯。

这时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呢？三年前，袁世凯被载沣赶回到河南彰德老家，此刻，他正在老家洹上村袁家花园里，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慢吞吞地垂杆钓鱼呢，简直就像一个老渔翁。谁能想到这就是权倾一时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呢？袁世凯也自称“洹上钓叟”，表示自己已经忘记了政治，不再过问国事。其实，他一天也没有忘记卷土重来。袁世凯虽离开了北洋，但他的心腹们却仍牢牢地控制着北洋大权。冯国璋、段祺瑞是他在北洋的代理人，巡警部侍郎赵秉钧是他的心腹，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是他的老友，总理大臣奕劻更是他的知交。袁世凯在家中设立了电报室，每日滴答一响，京城之事袁世凯了如指掌。冯国璋接到清政府去湖北镇压革命党的命令后，没有去湖北，却赶到彰德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告诉他：“慢慢走，等等看”，希望革命党把事闹大，使载沣无法收拾，再乘机夺取大权。于是，冯国璋、段祺瑞不听荫昌调遣，荫昌在信阳和孝感之间奔来奔去，无可奈何；载沣

等清朝权贵惶惶无主，袁世凯的老友们乘机掀起了一股拥护袁世凯重返政坛的声浪。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对载沣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见识、魄力，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抚，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不过这件事要办就办，若犹豫延迟，怕民军的局面再一扩大，更难收拾了。并且东交民巷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载沣本不愿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忍隐屈从。10月14日，载沣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袁世凯凭着多年的经验，断定清政府已衰弱到非求他出来不可的程度，清政府不给他水陆各军的指挥全权，他就不出山。于是，袁世凯回话：“脚病还未好呢，不能上任。”

载沣得知袁世凯拒绝出山，派徐世昌到河南劝请。袁世凯让徐世昌带回出山的六项条件：(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6)须与十分充足之军费。六条缺一不可。载沣眼看各省纷纷独立，只得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全权。袁世凯见载沣没有全部答应自己的要求，仍旧

拒绝出来。

10月29日,山西省宣布独立,革命烽火已经烧到清廷脚下。同一天,驻滦州的新军制统张绍曾、蓝天蔚通电清廷,要求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定宪法,削除皇族特权,如果清廷不允,就率军进攻北京。载沣丧魂落魄,不再坚持。10月30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宣布解除党禁。第二天,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内阁。这时的袁世凯也坐不住了,他生怕清朝一旦垮掉,他就无法要挟革命党,他在受命为内阁总理的当天,就奔往湖北孝感,督促冯国璋调动军队猛攻汉口,给革命军以重大打击。11月2日清军攻陷汉口。袁世凯为了稳住北方,派人刺杀了在石家庄活动的革命党人吴禄贞,破坏了滦州新军进攻北京计划。经过这一番表演,袁世凯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16日组成新内阁。内阁成员除了赵秉钧、王士珍、唐绍仪,还有立宪派梁启超、张謇。就这样,袁世凯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掌握了清王朝的全部权力。

11月27日,清军又攻占汉阳,冯国璋准备乘胜渡江攻取武昌,袁世凯亲自打长途电话加以制止,准备同南方革命党谈判。南方革命党人的军队经不住北洋军的进攻,也设法同袁世凯进行谈判,

南方各省代表会议决议：如果袁世凯“反正”，就公举他为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慝，所建设民国的大任付托给这样一个人靠不住，革命党人应该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之际，出兵倾覆满清政府，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国家。黄兴和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袁世凯是狡猾奸诈，但他只要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革命党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已经光复的土地也失去，到头来还是清王朝的天下。立宪派张謇等人为了在清室退位后社会秩序不致发生更大动荡，也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迅速向袁世凯受协交权。妥协，已成为南方难以逆转的主流。孙中山已无法控制大局，1月15日，他不得不正式表示：“如果清帝实行退让，宣布共和，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孙中山正式表态，使袁世凯对南方这一头放下心来，又将主要力量放在压迫清朝退位上去。尽

管如此，袁世凯表面上还口口声声表示要忠于清室。他对人说：“世凯世受国恩，虽形势如此，又怎能欺负朝廷的孤儿寡妇？”然而，就在孙中山正式表态的第二天，他以内阁全体名义上奏隆裕皇后，表示南方革命党力大无穷，清廷朝不保夕，民主如尧舜禅让，民心所归，非亡国可比，而且皇室尊荣不减，希望隆裕太后顺应民心，自行退位。

皇族亲贵像铁良、良弼等人这时认清了袁世凯大奸雄的真面目。他们组成“宗社党”，一方面决心同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一方面同清室之奸臣袁世凯拼命，他们筹划组织新内阁，取代袁世凯。他们给袁世凯一封书信，上面写道：“有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者，我辈决不容忍，愿意与阁下同归于尽！”铁良和良弼准备统率清军南下与革命军决战，如果战败，则考虑迁都热河，退保东北。

1月26日，袁世凯使出最后杀手锏，指使前线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倪嗣冲等四十二人联名通电，请清室退让，否则就率军杀回北京。这使清室受到极大震动，感到难以支持下去。当天，革命党人彭家珍用炸弹将亲贵中掌握兵权反对清室退让最坚决的良弼炸伤，两天后死去。他一死，宗社党不敢再公开反对退位，王公亲贵们都吓得噤若寒蝉。2月13日，隆裕太后抱着小皇帝溥

仪带着哭声宣布清室退位，接受优待条件。从此，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布灭亡，二千年来的皇帝专制制度从此也结束了。

清室宣告退位同一天，孙中山履行自己的诺言，向参议院请辞大总统职，并推荐袁世凯接替。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参议院在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为“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的第一华盛顿”。

孙中山虽然辞职，但对袁世凯并不放心，他在辞职文中提出三个条件，对袁世凯进行限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一切颁布的法制章程。”这三条中，除了让袁世凯遵守《临时约法》外，就是要袁世凯离开北京，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因为北京是各种旧社会势力的中心，而南京当时是革命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便于对袁世凯进行制约，对于这些袁世凯当然不愿意。

袁世凯表面上不动声色，满口答应极愿南行，实际上以种种借口进行抵制。2月27日，南京政府派遣专使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八人到达北

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特开正阳门隆重欢迎，为蔡元培等举行盛大宴会，并同专使商谈南下路线；暗中指使北洋军第三镇曹锟发动兵变，放火焚烧街道，袭击专使。袁世凯声称需要维持北方秩序，一时断难南行。蔡元培等完全相信了袁世凯，经商议，拟定三条办法：“一、取消袁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三、袁在北京行就职式。”这三条办法很快得到南京参议院的同意。袁世凯赢了，拒绝南下的目的达到了。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宣誓：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

就这样，民国虽然建立，清朝终于推翻，革命的果实却落到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里。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许多革命党人竟茫然了，觉得革命成功，该功成身退了。就连大革命家黄兴也消沉了，他在诗中写道：“三十九年知是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黄兴真的想归隐田园了。

然而，袁世凯、黎元洪之流并没有因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而手软。民国建立后，黎元洪在首义的武昌杀害了大批革命党人，至于袁世凯杀害的革

命党人更是数不胜数。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鲁迅先生后来深刻地反思道：“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头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志，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座去。”

革命党人夺取了政权又丧失了政权，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军阀。苦难的中国虽然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阵痛，却没有诞生出一个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新社会。辛亥革命的失败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在新的阶段，更高水平上继续展开。

十七、“二次革命”及其失败

一个庞然大物的清王朝竟在一夜之间倒掉了，许多革命党人一时都沉浸在狂欢中，认为中国已跨入了民主共和的新时期，建设新中国的理想该逐步实现了。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对未来的发展作出种种设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主张兴办实业；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强调政党政治。两者虽重点不同，却有许多息息相通之处，都是要建设近代化国家。

为了在落后的中国发展近代工业，孙中山把兴修四通八达的铁路看作必需的重要前提，他一再宣传要在十年内建设二十万里铁路。他1912年9月间北上会见袁世凯，也是为了取得袁世凯对他从事铁路建设的支持。

八月间，袁世凯隆重邀请孙中山、黄兴入京“共商国事”。9月份，孙中山、黄兴先后到京。袁世凯对“革命元勋”举行了盛大欢迎。北京正阳门车站前，用鲜花彩绸结成绚丽的欢迎坊，总统专用的金漆朱轮白马的马车迎接，倒出总统府供他们居住，多次宴请孙、黄，并同他们十三次亲切会晤，孙中山讲什么，他都一律点头称是。孙中山热心于铁路建设，袁世凯就授予他为全国铁路总办，并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袁世凯伪善而又高超的表演，迷惑了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兴奋地表示十年内不入政界，支持袁世凯当十年总统，让他练兵百万，自己负责修筑二十万里铁路。黄兴天真地主动要求解散南方军队，甚至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来当国民党领袖，袁世凯笑而不答。回到南京后，黄兴遣散了大量南方军队。孙中山回到上海，替袁世凯说了很多好话。

孙中山在给宋教仁的一封信中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

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日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这封信表述了孙中山这一时期的思想。

宋教仁在革命党人中，书本知识比其他人多，实际经验却少一些。他熟悉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财政等制度，还翻译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籍。他特别注意西方国家的民主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只要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民国建立后，他全力奔走的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组织一个实力强大的政党，一件是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

宋教仁在接替汪精卫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他立刻积极地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络，合并成立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由于孙中山几乎不问党事，宋教仁在党内实际上已总揽一切。国民党这个大党一成立，宋教仁把工作重点转到国会竞选活动上，力图在国会议员选举中争取多数席

位。他奔走湘、鄂、苏、沪等地，为国民党竞选。1912年底，各省开始进行正式国会议员的选举，国民党获得了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宋教仁踌躇满志，认为大局已定，可以成立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内阁了。他在一篇文章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强有力的政党内阁主持于上，决定国是”，又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分划有条理地加以确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

宋教仁对革命是忠贞的，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也是真诚的。但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掌握着一切实际权力，那些西方民主政治即使搬到了中国，也只是徒具形式。当他兴奋地写下五年后如何、十年后如何这些话时，谁能想到，离他惨死只有十天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乘火车北上进京时，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赵秉钧派人雇用的杀手开枪击中头部，22日死去。这位三十二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遇害，标志着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中国破产。

宋教仁遇刺，对毫无思想准备的国民党人来说，无异晴天霹雳。孙中山在血的事实面前，抛弃了对袁世凯的幻想，他中断了对日本的访问，赶回

上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力主讨袁。然而，国民党内响应孙中山主张的寥若晨星，地位和金钱使许多革命党人失去了革命意志，为了保住新得到的地位，国民党内一片妥协之声，召唤他们同袁世凯战斗的孙中山，倒被他们讥刺为“孙大炮”。

袁世凯看到国民党对起兵缺乏准备，意见不一，反而下决心发动内战，一举消灭国民党。他说：“我现在看透了孙、黄除捣乱外没别的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他们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就敢举兵征伐之。”6月9日，他借口李烈钧不服从政府，下令免其江西都督职，接着又解除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7月5日北洋军进逼九江，国民党不得不起兵应战。

7月12日，李烈钧奉孙中山命，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黄兴也在南京宣布独立。接着，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二次革命”。在袁世凯的几路进军和对南方军人的暗中收买下，南方各省一度进行的独立和抵抗很快就失败了，李烈钧从湖口败退，后来去了云南。黄兴从南京出走，到美国去了。孙中山等革命党同志再次逃亡日本。宣布独立的各省纷纷取消独立。国民党的

议员们,再也不妄想“议会中的多数”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吴景濂出面,宣布开除黄兴等人的党籍,表示自己同独立无关。而袁世凯对他们却没有客气,他派兵将议员们包围在会场内,强迫他们投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接着,便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了国民党党籍议员的证书。不久,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临时约法》,袁大总统独揽了大权,辛亥革命的全部成果都丧失了。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一教训太深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与破产,是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留给中国人的一笔最大的精神遗产。

当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一行人从上海出发东渡,再次踏上流亡的道路。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许多人都眼含热泪,他们回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风雨如晦。多少年魂牵梦系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十八、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失败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头几年,那是一个青黄不接、令人特别难熬的日子。革命正处在暂时的退潮中。旧的路已经走不通了,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可

是,新的出路在哪里?一时又没有答案。在那些日子里,很多人陷入消沉、悲观以至绝望的境地。有的人退入书斋,有的人竟削发为僧,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

但是,严峻的现实却不容许中国人长期沉浸在消极、苦闷和徬徨中。这以后短时间内,严酷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中国真正爱国的人们不得不再次起来抗争。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在中国山东半岛登陆,进攻德国占领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接着,日本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德国所占有的山东一切权利让予日本;日本享有南满、东蒙地区工商、土地、路矿、借款特权;延长租借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铁路期限九十九年;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用来写二十一条的纸上印有无畏战舰和机关枪的水印图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接受。

袁世凯面对日本的威逼,不得不妥协退让。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答应日本,除了第五号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各条都全部接受。

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订虽然是秘密进行,却

掩不住全国人民的耳目,国内人民奔走呼号,罢工抗议,游行示威,抵制日货。袁世凯对此一概斥为“排外之观念,为野蛮无礼之举动”,发布《大总统申令》,严加取缔。

在这种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卖国独裁的统治,是袁世凯每日思考的问题。在封建王朝中长期生活过来的袁世凯想到了皇帝的权威,他的确认为,皇帝的龙袍具有比大总统的礼服不知高多少倍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不但能够得到旧势力的拥护,而且可以博得众多“愚民”的膜拜,从而使主张民主共和的反对派无能为力。于是,袁大总统又想要当皇帝。

从1915年8月开始,袁世凯开始筹划帝制。袁世凯表示要征求多数国民的公意决定国体问题。全国“国民代表”在各省“军政长官”监督之下,投票决定国体问题。参议院汇总全国“国民代表”共一九九三人投票,一律赞成中国实行君主制,并“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于是,参议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假惺惺地将劝进书退回,很不高兴地说:“我要是帝制自为,做了皇帝,那就背弃了过去的誓言了,信义怎么解释?”参议院当天又再次“劝进”,袁世凯才“被迫”同意了。12月12日,他发布

命令,自己担当“中华帝国”的皇帝,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接着,他下令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极即皇帝位。

袁世凯没有想到,他公然复辟帝制的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很快他就陷入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之中。

蔡锷是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的都督,在云南很有威望。他对老师梁启超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都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便安然登了大殿,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民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次不可”。梁、蔡等经过认真商量后,决定一文一武两步方案:梁启超发表文章,张正义之声;蔡锷见机潜回云南,发动起义。

不久,梁启超写了洋洋万言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毅然在京津各大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在一片帝制的鼓噪声中发表,且出于以稳健著称的梁启超之手,引起全国各阶层的强烈反响。

12月19日,蔡锷历尽千难万险从万里外回到云南,昆明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出城迎接数十里。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联合各派反袁势力,组成护国军政府,以云

南将军唐继尧为都督，蔡锷、李烈钧为第一、第二军总司令，分别进攻四川、贵州和广西。1916年1月至5月，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独立。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奉天、甘肃等省，也纷纷起来反对袁世凯。

袁世凯调军队十多万人对付护国军，但军心涣散，被蔡锷打得节节败退。日、英、美等国看到袁世凯的统治基础已渐崩溃，放弃了对他的支持，北洋将领冯国璋也电告袁世凯还是自动退位为好。袁世凯这才感到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3月22日无可奈何地宣布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就这样，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彻底破灭了。

然而，袁世凯还不甘心下台，他希望依靠手中的北洋军队，继续做总统。护国军坚持让他下台，并联合滇、黔、两广等省反袁势力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与袁世凯政权相对抗。梁启超先后发表几篇文章，向全国人民揭露袁世凯的丑恶面目。他写道：“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彼袁氏盖古今天下第一爱说谎且善说谎之人也。以前清托孤大臣而盗卖前清，以民国服务之公仆而盗窃民国，既假外人言论以劫持吾民，复冒用吾民名义以欺罔列国。不自量而冒险尝试，

一遇挫折则颯然乞怜。以总统为未足则覬覦皇帝，若皇帝做不成则又将谋保总统。险诈反复，卑劣无耻，一至此极。以此等人而为一国之元首，吾实为中国人羞之，以此等人而全世界人类四分之一归其统治，吾实为全世界人类羞之。”梁在起草的致各省信中指出：“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本抚军等既扶义以兴，便义无反顾，若有不济，宁率所部十数万众，同蹈东海，无所怨悔，而断不肯干

一次复辟帝制，请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登大宝”，中国又重新变成了“大清帝国”，半个月后，这场闹剧又收场了。北京政府当权者还是北洋军阀。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下去，使得真正有志气的爱国者重新思考拯救祖国的道路。这是中国思想界大转变的契机。但新的道路并不是一步就能踏上的。他们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共和制度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来由。

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他在《新青年》上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认为，造成中国人民愚昧落后的根源是封建道德，而封建道德的根本就是封建主义

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奴隶道德。因此，陈独秀等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思想发动了猛烈的抨击。

1916年底，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他锐意革新，有意扶植新文化。他翻阅了《新青年》，看了陈独秀的文章，就到前门外陈独秀的住所拜访，邀请陈君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同时到北大任教的还有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他们志同道合，很自然地聚集起来，以《新青年》为阵地，使新文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陈独秀等人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们公开表明自己所向往和提倡的新文化，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他们介绍西洋思想文化，理直气壮地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发动猛烈的进攻。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写道：“追本溯源，本杂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这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民主”和

“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的对立物,就是专制和愚昧。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野蛮统治遗留的恶果。

这一次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陈独秀一开始就指出:“在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又想在伦理上保留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合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四川的吴虞写道:儒家提倡的那种“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他指名痛斥孔子:“盗丘之遗祸及万世。”过去,孔孟学说的卫道士们动辄指斥别人是“洪水猛兽”,现在把这顶帽子扣到他们自己头上,这在当时的确是石破天惊之论。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更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它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是无与伦比的。

在《新青年》的有力推动和影响下,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版。研究科学、

讲求实业、人格独立、文学革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这场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时更为广泛深刻。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威力猛烈，势如破竹，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它清扫了地基，为人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人们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这样的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中国的现实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如何改造，许多人最初并不清楚。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梁启超去欧洲游历了一年。他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欧洲，到处是沮丧、徬徨和“世纪末”的失魂落魄情绪。一个美国记者对他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梁启超归国以后写了《欧游心影录》，描述了他在欧洲亲眼目睹的这幅凄惨景象：“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遇到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从中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梁启超

素来以政治态度温和而富于敏感著称。他的这些言论自然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现在,中国先进分子长期钦羡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也如此尖锐,缺陷如此明显,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走下去吗?更何况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很难在中国扎根,取得理想的效果。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更新的学说,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正当人们思考这些问题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在这个中国近邻大国发生的巨大革命变动,自然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格外关注,人们需要了解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报纸杂志上连续地刊载报道俄国革命的消息和评论。当人们看到社会主义的苏俄经历了饥饿、内战、外国武装干涉等等磨难,依然站稳了脚跟,社会主义的理想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不禁被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吸引住了。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苏俄,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先进分子很快得出结论:走俄国人的道路,中国才能获得独立、富强和真正的民主,才能使中国的革命取得成功。

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俄国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载《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序言》的译文。这表明，中国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中新的因素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其他有着不同经历、不同地位的中国先进分子也纷纷转到这条道路上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回忆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思想不能不发生激烈的变化。当时我感觉：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这种思想经历并不只是吴玉章一个人才有。

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任何人心血来潮凭空臆想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内在矛盾的产物。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不是任何人主观

意志所能左右的,而是时代潮流发展的结果。

二十、新世纪的曙光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可以使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这种千万人的思想大变动,不是几个刊物或几次讲话的影响所能带来的。

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爱国运动,便是这样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这次运动以山东问题为导火线,发展成为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反日爱国运动。本来,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国,是战胜国之一。巴黎和会召开时,人们都期望能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收回,可是,事情却出人意料,和会不但没有支持中国这一合理要求,而且把德国攫取的利益转交给日本。这不能不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5月4日下午,北京各高校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

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这段时间内,中国人民中也发生过多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

行动,可是它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较少人参加的爱国活动。五四运动就不同了,它牵动的社会面太广了,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许多人忧愤填膺,他们聚在一起便畅谈国家面对的危局,长期郁积着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大爆发。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许多地方的工人、店员以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都积极行动起来,罢工罢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北洋政府不得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各种学生团体、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原来处于被统治状态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直接行动起来,关心国家的危亡,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吴玉章说:当时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这场以挽救祖国危亡为目标的伟大群众斗争,带来了千百万人思想的大解放,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在斗争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当运动从奔腾澎湃的大潮中逐渐平伏下来时,一些先进分子却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聚集在一起,结成新的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它的主流。

接着,在北京和上海形成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初,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一批学生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参加者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积极分子。在上海,陈独秀被从北京逐出来到这里,1920年5月,他在上海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还有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

尽管五四运动刚刚爆发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很少,卷入这场运动的人的思想状况相当复杂,但五四运动毕竟是中国近代思想大变动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这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等等,只能说是它的酝酿和前奏。从五四运动这个时刻起,才开始真正是千百万群众的大发动。人们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忧虑,积极地关心和参与国事,而且勇敢而脚踏实地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他们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专制和愚昧最深刻的根源,要想推翻他们的统治,就要像苏俄那样,发动下层社会的民众,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去建设新社会。

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年內，全国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刊物达四百种，第二年在全国便有了数目可观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到1921年，全国已经在上海、北京、武汉、湖南、济南、广州出现共产主义小组多个，留法、留日、留苏的中国学生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都是当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其中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1921年7月，由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新时期的起点。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步伐真是太迅速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相隔只有短短七年多。可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历了一段失望、怀疑、探索和学习的漫长旅程，在这个旅程的尽头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它，接受它。这不是轻易得出的结论，而是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才取得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如饥似渴地追求救国的真理，经历过千辛万苦，遭受过多少次严重的挫折。但他们从不变心，更不屈服，以常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忘我精神，前仆后继地顽强奋斗。他们在

实践中进行了多次反复比较,努力把马克思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取得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今天,中国革命先驱者,包括辛亥革命时期的志士仁人们所做的一切,是永远值得我们深情缅怀的。他们在近代中国这块国土上,在漫长的探索奋斗过程中所取得经验和教训,在今天仍会给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他们所留下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吸取的。